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程刚

(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 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 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 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 “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 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 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 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 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 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模式, 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关键词:《诗本义》;《易童子问》; 欧阳修; 经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066-06

欧阳修的经学成就主要在《诗经》学与《易经》学, 他的《诗本义》是宋代《诗经》学中重要的一部, 全书15卷。《诗本义》1至12卷, 论及《诗经》作品114篇; 第13卷是《一义解》和《取舍义》, 其中《取舍义》是对毛传、郑笺的比较与取舍; 第14卷是《时世论》《本末论》《幽问》《鲁问》《序问》, 所谓“二论”“三问”; 第15卷是《诗统解序》和《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十月之交解》《鲁颂解》《商颂解》等八篇。卷末附录《诗图总序》、《郑氏诗谱补亡》。朱熹对于欧阳修的《诗本义》多有称赞, 他说:“欧阳会文章, 故《诗》意得之亦多。……《诗本义》中辨毛、郑处, 文辞舒缓, 而其说直到底, 不可移易。……子由《诗解》好处多, 欧公《诗本义》亦好。”^{[1](2089-2090)}朱熹在他的《诗集传》中也对《诗本义》多有借鉴之处, 裴普贤经过研究得出结论: 朱熹《诗集传》全从欧阳修《诗本义》的至少有二十余篇, 从欧阳修《诗本义》的数十篇。欧阳修在《诗》《易》两部经典的阐释中表现出了较为一致的经学阐释方法与学风, 但因为文本的差异, 即《易》是纯经学的著作, 而《诗》是文学与经学杂糅的著作, 相应地欧阳修在经学的阐释方法上也是同中有异。

一、“务明大本”的阐释目的

欧阳发等在《先公事迹》中说:“其于经术, 务明其大本而本于性情, 其所发明简易明白。”^{[2](2626)}吴充在为欧阳修做的《行状》中说:“于经术, 务究大本。其所发明简易明白。”^{[2](2693)}从经学阐释目的来说, 欧阳修就是抓住“大本”, 略去细节。这个“大本”在欧阳修的《诗》学与《易》学研究中, 有所不同。具体说, 在《易》中他常谈“大义”, 而在《诗》学中则是“本义”和“本意”。

欧阳修在《易或问》中说:“卦、《彖》、《象》辞, 大义也。大义简而要, 故其辞易而明。”^{[2](877)}就是说在《周易》的组成部分中卦辞远比爻辞大, 《易经》远比《易传》大; 在《易传》中《彖传》《象传》远比其他传大。而从《易》学阐释流派说, 所谓的“大”学就是义理之学, 即“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 而“小”学主要是“《易》之末”的占筮之学, 象数之学, 章句之学等。他说:“大衍, 《易》之末也, 何必尽心焉也。……大衍, 筮占之一法耳, 非文王之事也。……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

收稿日期: 2011-08-26; 修回日期: 2011-10-29

基金项目: 第四十九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宋代易学与宋代文学”(20110490917)

作者简介: 程刚(1976-), 男, 安徽繁昌人, 讲师, 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 主要研究方向: 宋代文学。

知此然后知学《易》矣。”^{[2](301)}

欧阳修“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解经思想在他的易学著作《易童子问》有具体的体现。在《易童子问》中他只对卦义以及《十翼》中的《彖》、《象》，做义理的阐释，而对于象数、训诂、占筮几乎不论。如在《师》卦中他表达了“兵非圣王之所务”的反战思想；^{[2](1108)}在《损》《益》中阐释了他“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的民本思想；^{[2](1113)}在《归妹》《家人》卦中表达了“女下男，凶”和“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的男尊女卑思想。^{[2](1112-1116)}在人生哲理方面，欧阳修说：“戒人之习恶而不自知，诱人于习善而不倦。”^{[2](1110)}在《既济》卦中他说：“人情处危则虑深，居安则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2](1117)}

欧阳修在《易经》研究中是“得其大以兼其小”，抓住了义理，就是抓住了大义。在《诗经》研究中则是主张“得其本而通其末”，那么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他说：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2](892)}

朱熹对于欧阳修的“本末论”非常推崇，他称：“其论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了。”^{[1](2089)}在这里欧阳修将诗学研究的目的，分成两本、两末，把“考其义类”“用之宗庙”的“太师之职”，与“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的“经师之业”，作为《诗经》的“末”，这与他《易经》阐释中对章句注疏的轻视是一致的。欧阳修还把“善则美，恶则刺”的“诗人之意”和“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的“圣人之志”看成两本，前者是“本意之本”，而后者是“根本之本”。此两本中作为“根本之本”的“圣人之志”，正与欧阳修在《易经》研究中力图发掘圣人所寄予《易》中的“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的义理之“大”是相一致的。但与一般经学家主旨在发掘圣人的意旨不同，欧阳修还要在《诗经》的研究中试图发掘“本意之本”，即他所说的“美者美之，恶者刺之”的“诗人之意”，而这样的“诗人之意”并不是时时与“圣人之志”相重合的，但欧阳修同样赋予了二者一样重要的“本”的地位，这是欧阳修对于《诗经》的经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双重性质的认

识所决定的，“圣人之志”指向了《诗经》的经学文本属性，而“诗人之意”则指向了《诗经》的文学文本属性。

欧阳修经学阐释是“务明大本”，在《易》学中欧阳修强调《易》学有“大、小”之别，采取的阐释方法是“得其大以兼其小”；在《诗》学中则强调《诗》学有“本、末”之分，采取的阐释方法是“得其本而通其末”。经学阐释中以训诂、章句、注疏、象数、讖纬等成分为“小”、为“末”的思想也一致。但因为《易经》与《诗经》的文本性质不同，对于“大”与“本”的认识则不同。与《易经》研究中只把圣人要表达的义理看成“大”不同，在《诗经》研究中设立了两个“本”。即孔子通过删改、整理《诗经》来表达其“圣人之志”是“本”，与来源于创作者的原意的“诗人之意”的“本”，可以说一个是“根本之本”，一个是“本意之本”。这两个“本”之间分别指向了《诗经》的两种文本属性。

二、“人情相通”的阐释根据

欧阳修是宋代疑经思潮的领军人物，他疑经的根据和解经的工具就是“人情”，以是否符合“人情”来判断注疏的可靠性，以“人情”相通来阐释经典。为什么可以“人情”解经？欧阳修在《诗本义·出车》中说：“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3](44)}在欧阳修看来“六经简要”，“诗文简易”，“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2](1015)}他认为那些不合人情、看似高深的解经著作可能值得怀疑，而他自己的解经也贯彻了合于“人情”的精神。欧阳修的“人情”是什么？很多文章在谈到欧阳修《诗本义》的“人情”解经时，说这是回归诗歌抒情文学的本性，这个说法不太准确。①“人情”解经是欧阳修经学研究一大特征，不惟是《诗经》的诗歌文本，《春秋》是“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2](880)}《尚书·泰誓》中的“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之所以是“妄说”，也是因为“不近人情”，^{[2](312)}在《易经》的研究中也以人情解经。②欧阳修的人情含义较为复杂，有时是情感，有时指常理。台湾学者裴普贤认为“人情”指“情理”，欧阳修是“凭这‘情理’两字去辨别毛郑的得失……欧公说诗，就是以人情的常理为准则”。^{[4](99)}蒋立甫认为欧阳修的人情内涵丰富，既包括“感情”，也包括“事理”“物理”。^{[5](7)}杨新勋认为“人情”是“世俗理性”。^{[6](70)}可见欧阳修的“人情”与我们常说的情感不完全一致，既包括我们说的“人的情感”，同时还包括“人的理性”，尤其是一种

经验主义的常识与理性。从欧阳修《诗本义·四月》中说的“推于人情，决无此理”可见一斑。^{[3](62)}而这两点在《易经》学与《诗经》学表现略有不同。在《易经》学中以“人情”解经，多指“人的理性”；而在《诗经》学中，则是理性与情感皆有，这与《易经》《诗经》的文本性质的差异是有关系的。

《诗本义》以“人情”作为论据、工具，对毛传、郑笺提出质疑。欧阳修主要批评了几种不合“人情”的经学阐释：“妄说”“怪说”“奇说”“异说”“曲说”“衍说”“妄说”“臆说”等等。^①“妄说”“怪说”“奇说”“异说”，这是指结合谶纬之学，把六经神秘化的解经方式。在《诗经》的《生民》中关于周族始祖后稷母亲姜嫄履天帝足迹受孕而生的传说，欧阳修认为：“夫妇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为异，欲显其灵而以天子之子弃之牛羊之径及林间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3](81)}对于如此不近人情、“理不能通”的故事，郑玄“自惑谶纬，专用命历”，致使诗意更加难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解经者的“好奇”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于《诗经》中歌颂的对象过于崇拜而欲神化之。欧阳修在《诗本义·玄鸟》中说：“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目的是“欲神其事，故务为奇说也”。郑玄也不能免俗，“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于怪说尤笃信”。^{[3](110)}在《诗本义·文王》中说：“谶纬符命怪妄之说不胜数，本欲誉文王而尊之，其实积毁之言也。”^{[3](74)}批评了郑玄解诗用谶纬，造成《诗经》的错乱、怪异，这些怪异之说不仅无助于神圣文王的形象，反而造成不良的影响。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比欧阳修保守，苏轼在《东坡书传》中说：“《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谶纬，而后之君子亦矫枉过正。”^{[7](446)}苏轼所说的“矫枉过正”者可能与欧阳修有关。在排除经学中谶纬之学，欧阳修呼声最大，他上书皇帝要删除《九经正义》中的谶纬成分，说它们“所载既博，所择不精，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也。臣欲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2](1707)}在《易经》与《诗经》的具体阐释中更是不遗余力地排除谶纬成分。^②“曲说”，是解经者曲解六经，在难圆其说的时候穿凿附会、曲为之说，难以令人信服。在《诗本义·女曰鸡鸣》中，欧阳修认为全诗本是夫妻二人的对话，诗中“知子来之”的“子”本指妻子，而郑玄非要将其解释为“异国之宾客”，这让欧阳修不满，他批评这样的解释“委曲生意而失诗本义……殊不近人情”。^{[3](27)}《节南山》诗则是“不近人情之甚者……尤为曲说”。^{[3](50)}在《新台》中认为“曲

成己说”的解诗方法是“尤不可取”的。^{[3](21)}欧阳修还认为毛、郑解经喜欢穿凿，“穿凿泥滞，于义不通”（《皇皇者华》）、“穿凿可知”（《酌》）。与穿凿说诗不同，欧阳修往往在无法说通的情况下保持“从阙”，这是难能可贵的客观精神。^③“衍说”，指的是一种增意解经。

《有骖》诗中有对强壮的肥马的描写，毛传进而据此说肥马是喻臣子，欧阳修认为此是“衍说”。而郑玄更是变本加厉，说这是喻鲁僖公用人“必先足其禄食”，养马丰其食则强壮，养臣丰其食则忠心。欧阳修认为：“诗文所无，此又妄意诗人而委曲为说，故失诗之义愈远野……此岂近于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为衍说以自累也。”^{[3](99)}解经者增意解经不合人情，在《湛露》中也是如此，《湛露》诗写天子宴诸侯，并没有明确说宴请何人，而到了郑玄的笔下则变成了“二章为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章为燕二王后者”，而这些东西在文本中找不到根据，欧阳修认为这样的解释“诗既无文，皆为衍说”。^{[3](45)}^④“臆说”，则是解经者离开六经本身，没有事实基础的，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六经。《氓》诗写一被弃女子的控诉，欧阳修认同诗序所言。但欧阳修认为全诗都是女子所歌，“桑之未落”节食女子自悔之词，而郑玄却认为这是“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欧阳修不认同此说，“诗人序述女语尔，不知郑氏何从知为贤者之辞，盖臆说也”。^{[3](23)}郑玄全凭想象，把诗中妻子自言之语解释成贤者的告诫，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了诗篇。^⑤“迂说”是故作高深，把很平易、贴近的经义解释得过于迂远，这也是汉代解经的一大风气，欧阳修对此有很多批评。如《渐渐之石》一诗是征战将士慨叹辛劳的作品，到了郑玄这里把“渐渐之石”比喻成“戎狄不可伐”，把“山川悠远”比喻成“荆舒之所处”，把本来将士慨叹行军艰难的诗句做了非常复杂而隐晦的比附，这简直就是“舍简易而就迂回”。^{[3](73)}在《瓠有苦叶》诗中欧阳修也认为郑玄“其说失之迂远”，深文周纳。诗中“深则厉，浅则揭”句，意为渡河水深则连衣过河，水浅则提衣过河，而郑玄“喻男女才性贤不肖，长幼宜相当，乃是刺婚姻不时，男女不相当”，^{[3](17)}这样的解诗在欧阳修看来，把简单的诗意弄得复杂了，把平易的诗意弄得迂远了。

在《易经》研究中欧阳修也以是否合乎“人情”作为怀疑的根据与经学阐释的原则。在《易童子问》中提到“人情”处有8次，他以此大力排斥《易传》及后人解易“不近人情”之处，如以谶纬解《易》、以占筮解《易》、以图书解《易》等。图书学派是宋易的象数派分支，以黄河龙马负图为河图，洛水神龟背上书为洛书，欧阳修明确反对这些说法，其诗云：“马图出河龟

负畴,自古怪说何悠悠。”^{[2](86)}《系辞传》中有八卦来于河图洛书,和来于伏羲观象两种说法,后人为弥合这个矛盾,就“曲为之说”,欧阳修认为这些曲说,“此岂近于人情乎?”^{[2](1122)}八卦还有出于揲蓍说,欧阳修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要说是孔子所讲,实在不合情理,他说:“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2](1121)}这是把“人情”作为疑经惑传的根据,在具体的解经当中则常常“人情相推”来理解《易经》的原则,如他在《谦》卦的阐释中说的“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神迹,无以异也”。^{[2](1109)}论到《系辞》的作者非孔子时说:“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2](1123)}这就把被汉唐注疏抬上神坛的六经重新降到人间,把看似高深莫测的六经解释为平易简要的人事义理。

以人情作为怀疑与阐释的根据、工具,是欧阳修经学的一大特征,在他的《易》学、《诗》学、《春秋》学中都有体现,但同中有异。欧阳修的人情本来就包括情与理,在《易童子问》中出现的8次“人情”都是指一种人之常理的“世俗理性”,而在《诗本义》中出现的“人情”,则常常是包含了常理与情感的“情、理结合”的“人情”。因为《诗经》具有经学与文学的双重文本性质,与此相一致的,欧阳修的“人情”解经在诗学中便具有了双重属性。从经学角度说,欧阳修主要以“人情”中的“理性”来阐释《诗经》,如在《生民》诗中认为姜嫄履天帝足迹受孕而生后稷母亲的传说“不近人情”,这是比较明显的合乎常理的“人情”来解经的。而从《诗经》的抒情文本的性质出发,欧阳修则肯定要涉及到“人情”中的“情感”,这是和《易经》单纯的经学文本不同的地方。如他在《诗本义》中所引王通的话:“诗出于民之性情,情性其能无哉?”^{[3](121)}诗本来就是出于情感的,欧阳修对于王通的认识是赞同的。《诗本义·汉广》中说:“政化之行可使人顾礼义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尽无情欲心也。”^{[3](9)}这里肯定了人的“情欲心”在世间的存在,同样在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中也存在这样的“情欲心”,所以从“人情”出发解经,不仅要考虑合理,还要考虑合情。所以欧阳修把这首诗就解释成了一首“极陈男女之情”的情诗。再比如前引《诗本义·出车》的一段话:“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这里的人情就包括了理性与情感,对于抒情的诗歌的理解除了利用人之常理,更需要从情感相通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把握就会更加准确。

三、“据文考义”的阐释方法

欧阳修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经学家,前者的影响与声望也远远大于后者。作为一位文学家从事经学的研究,他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姑且称之为“以文解经”。就是在经学阐释中,首先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怀疑经学著作真伪,判断他人经学阐释的得失之处,进而表达自己的理解。

在《易童子问》中,他三次提到“考其文义”,把《易传》作为一个文本,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其中存在的不合逻辑之处往往就是值得怀疑之处,也就是欧阳修的突破之处。欧阳修认为圣人的文字“简易明白”,孔子的文章“其言愈简,其义愈深”。^{[2](1120)}而据传孔子所作的《系辞传》《文言传》等《易传》却存在着“众说淆乱”“繁衍丛脞”“自相乖戾”“自相抵牾”等现象,所以说《易传》是孔子所作是不合逻辑的。①“众说淆乱”“繁衍丛脞”,比如“三才之道”的论述,有两次重复,《文言》乾之初九、《系辞传》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等语句有四处重复,“系辞焉而明吉凶”有五处重复。②“自相乖戾”“自相抵牾”,如《系辞传》中关于八卦的起源有三说:一是八卦来于天降(河出图,洛出书说),一是人为(圣人观象立卦说),一是八卦出于揲蓍说。这三种说法明显的相矛盾,这也可以看出《系辞传》非圣人所作。③关于“子曰”,欧阳修认为在《论语》中因为是弟子记载孔子的话,所以才出现了“子曰”的字眼,而《易传》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亲自所著,那么出现“子曰”的字眼岂不自相矛盾?所以欧阳修说:“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2](1123)}正是这些《易传》文本自身出现的繁复与矛盾,给了欧阳修怀疑的证据。

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从一些《易传》的文本矛盾、重复处的不合逻辑性,对它的真实性以及作者是否为孔子提出质疑。而欧阳修在《诗经》研究中,对于毛传、郑笺的怀疑,除掉从文本的逻辑性出发外,更多地从其文学性出发。这与《易》是单纯表达义理的经学著作,而《诗》则是义理与抒情的文学与经学的双重文本也是相一致的。这一点很多学者在文章中都说过。较早的如蒋立甫在《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指出欧阳修破旧说,^[5]求本义有三个途径分别是:依据文本、求诸人情、考之文理。欧阳修在《诗本义》中会经从文本、文理、文风、文意(义)等角度去分析阐释《诗经》,如:①文本,强调

《诗经》研究要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而不仅仅是从序、传、笺等出发。诸如:“诗无明文,乃是臆说”“据文求义”“直考诗文”“以文考义”“考文求义”“考诗本义”“考诗及序,皆了无此义,失之尤远”等。^②文理,从毛、郑解释《诗》的不合文理处,质疑他们的理解、判断,诸如:“不成文理”“以文理考之”“岂成文理”“义岂得通”“自相违戾”“自相乖戾”“上下文不相须,岂成文理”。或者是欧阳修在文理基础上推断诗本义,“以文理推之”“以上下文理推之”等。例如:毛传在解释《思齐》中将“思齐”解释为思庄,欧阳修则说“以文理推之,当读如见贤思齐之齐也。”^{[3](77)}《氓》全诗是女责男语,郑玄认为其中“尔卜尔筮”是男告女,欧阳修则认为:“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3](23)}③文风,欧阳修认为“诗文本易”,所以从这样的文风出发,质疑毛、郑的注疏。诸如:“文显而义明”“经义固常简直明白”“义至简而明”“义简而易明”“义简直而易明”“其义简直”等。^④文意,欧阳修《诗经》研究从文本出发,所以文本的文意应该是和谐、相属、统一的,而毛、郑注疏出现了很多的文意散乱、前后乖离处,欧阳修多有批评。诸如:“与下章意不相属”“文意乖离而不相属”“前后之意顿殊”“以文意考之”“考诗之意”“以义考之”“文意散离,其后错乱”“文义散断,前后错杂”“误分章句,失诗本义”“文意散离,不相终始”“考诗之文义,不如此也”“以上下文考之,非诗之本义”“文意不属”等。比如《竹竿》诗是写女子远嫁思乡而不得归,欧阳修认为“据文求义,中篇无比兴之言”。但毛、郑“曲为之说”,把“簞簞竹竿,以钓于淇”比喻成“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欧阳修认为这样的解释无法和下文的“岂不尔思,远莫致之”相吻合,所以这样的解释“与下文不相属”。^{[3](24)}这是他从诗歌文本的文意统一性出发,来判断毛、郑的得失。此外欧阳修还强调尊重文本但不拘泥于文本,反对过于拘泥文本而失掉诗意。诸如:“执文害意”“以文害辞,此孟子所患也”。

从欧阳修解诗例证可以看出,在《诗经》的研究中,欧阳修很重视把它作为一个文本,而这个文本性质在六经中又与其它几部经典不同,所以在《易》的研究中,多从文本的逻辑性出发,而在《诗》的研究中,则从逻辑性与文学性两个角度出发,来质疑毛、郑注疏,建立自己的本义阐释。

四、“是非自相攻”的阐释模式

欧阳修经学阐释的模式是很特别的,他没有采用

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也没有按照先六经原文再个人阐释的模式展开,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模式展开。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①欧阳修是“宋代疑经的第一人”,^{[8](199)}欧阳修的怀疑在《易经》学与《诗经》学中都有所体现。四库馆臣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益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9](190)}在《诗本义》中对于毛传、郑笺大加批判,尤其是郑笺。在《诗解统序》中说:“毛、郑二学,其说焜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予欲志于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余经……。”^{[2](884)}在《易经》阐释中对《易传》为孔子作的“千古定论”提出质疑,这是欧阳修经学学术中最光辉的一页。在《诗本义》中对注疏的反击,在《易童子问》中对《易传》的怀疑,可能使得欧阳修在抛弃这些注疏、传文的内容的同时,抛弃了逐字逐句的注疏以及为经立传的方式来展开它的经学研究,而采用了论说体的方式。^②欧阳修经学的成就“破”大于“立”,破前人权威,破圣人光环,破六经的神秘。与这种“破”的阐释倾向想一致,他的经学研究往往也是要以论辩、批判的方式展开。正如他在《读书》诗中所云:

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

经典被伪说所掩盖,要破除这种对六经的遮蔽,必须具有推翻权威的勇气。所以欧阳修不用汉唐注疏的阐释方式,而采用论说体的方式。此外他的《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易或问》中还有一个模式,姑且用他《读书》诗中所说的,称之为“是非自相攻”的模式。具体来说,在《易童子问》中欧修采取了“童子问曰”、“(答)曰”的问答方式来抒发己见。童子在欧阳修笔下往往化身为异端的或者流行学说的代言人,欧阳修则通过反击其错误的观点,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在《诗本义》中则采用“论曰”、“本义曰”的论辩方式,先反击毛传、郑笺,接着再叙以己意。如《易童子问》的第一则:

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曰:“众辞淆乱,质诸圣。《象》者,圣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之书乎?”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

则又以人事言之, 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

首先是设计了一个童子的问题, 欧阳修借着回答的机会抨击了“众辞淆乱”的阐释, 接下来借童子问阐释了他对于“元、亨、利、贞”四德非孔子言的考证成果, 最后欧阳修表述了他的怀疑, 提出自己的观点“六十四卦皆言人事”。这里欧阳修设计了三段问答, 一反一正, 展开自己的观点。

欧阳修在《诗本义》中研究了《诗经》中的 114 篇, 其中有 88 篇采用了先破后立的模式, 即先抨击毛郑的经学阐释, 并在此基础上表述自己对《诗经》本义的理解, 具体就是“论曰”“本义曰”的模式, 如《叔于田》篇:

论曰:《叔于田》之义至简而明, 毛、郑于饮酒服马, 无所解说, 而谓巷居无人者, 国人注心于叔似如无人处, 不惟其说迂疏且与下二章饮酒服马文义不类, 以此知非诗人本意也, 虽为小失不可不正。

本义曰: 诗人言大叔得众国人爱之, 以谓叔出于田则所居之巷无人矣。非实无人, 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贤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则巷无可共饮酒之人矣, 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则巷无能服马之人矣, 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爱之之辞。^{[3](26)}

欧阳修先在“论曰”部分, 从文意的角度反驳了毛郑的解释, 接着在“本义曰”部分阐释了自己对诗篇的理解, 这种方式在实质上与《易童子问》中的“童子问曰”“(答)曰”的模式是一致的, 也就是他在诗中说的让“是非自相攻”, 把两个相反的观点摆出来, 让人一目了然。漆侠说:“宋学具有非常强烈的战斗性。”^{[8](307)}这个战斗性在欧阳修的《读书》诗中得到了体现, 更在他的经学阐释模式中得到具体的实践。这既是他读

书的方法, 也是他治经的方法。

《诗经》《周易》都是六经之一, 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对这两部经典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周易》是较为纯粹的经学文本, 而《诗经》则是经学与文学的复合文本, 所以他的阐释原则与方法同中有异。首先, 从经学阐释目的来说, 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 但因为二书经学文本性质的差异, “大本”在《易童子问》中主要指“义理之学”, 而在《诗本义》中则有“圣人之志”与“诗人之意”两类; 其次, 欧阳修在对《诗经》《易经》的阐释中都以“人情”为依据, 但对于“情”的理解在两部经典的阐释中也存在差异。《周易》的“人情解经”多从理性出发, 而《诗经》的“人情解经”则从理性与情感两个角度出发; 再次, 欧阳修在经学阐释中, 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 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怀疑经学著作真伪, 判断经学阐释的得失之处, 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 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 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

参考文献:

- [1]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3] 欧阳修. 毛诗本义[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 [4] 裴普贤.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M]. 台北: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1.
- [5] 蒋立甫. 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2(1).
- [6] 杨新勋. 宋代疑经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7] 苏轼. 东坡书传[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 [8] 漆侠. 宋学的发展与演变[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 [9]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interpretation of Ouyang Xiu's *Yi Tong Zi Wen* and *Shi Ben Yi*

CHENG Gang

(Economic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Ouyang Xiu is an important scholar in Song dynasty, *Yi Tong Zi Wen* and *Shi Ben Yi*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academic works. In these works, Ouyang Xiu use different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ex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purposes, Ouyang Xiu grasped the fundamental idea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wo books, Ouyang Xiu took “feelings” as the basis, but the meaning of feelings was different. Ouyang Xiu considered “Zhou Yi” “The Book of Songs” as a self-contained text, from the text of the context, liberal arts, style, etc. pointed doubts of the authenticity, and determine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explain to express his own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Yi Tong Zi Wen*; *Shi Ben Yi*; Ou Yang Xiu; interpretation

[编辑: 胡兴华]